

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的 国民核算新模式

——关于国民大核算体系的理论思考

戴亦一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probe into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ing on Large Scale (SNALS)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for the ultimate goal, only SNALS can be the dest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accounting u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国民大核算；模式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二战以来，备受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全球经济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进入 70 年代后，人们逐渐发现，由于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也为之付出了相当重大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贫富悬殊……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们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更是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自 80 年代后期，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实施从传统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向强调社会、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全方位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转变。这种观点很快便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随着各国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转变，服务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受到了新的挑战。人们认识到，必须同时开展和加强社会、人口、科技、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核算。若干年来，联合国聘请专家先后制定了一些核算制度和办法，包括 SSDS、FSDS、FDES、SEEA 等，但都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彼此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因此，很有必要也有可能从现有几大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国民大核算体系。

应该说，所谓“国民大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ing on Large Scale 简称 SNALS）的提法，不仅目前国内还比较陌生，就是在一贯居国民核算研究领域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国民大核算体系思想的出现，也仅仅是本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事情。据笔者考证，国际上最早正式提出“国民大核算体系”概念的学者，当属我国著名经济与统计学家钱伯海教授。在其领衔下，厦门大学国民经济与核算研究所曾于 1992 年申请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开发应用研究》。在课题的立项申请报告中，钱先生首次提出了“国民大核算体系”的概念。在钱先生的指导下，笔者曾于 1996 年撰写了国内

首篇有关国民大核算体系研究的论文——《国民大核算体系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①。另外,由钱先生指导的博士后耿修林则于1997年9月撰写了国内第一本题为《国民大核算问题研究》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油印本)。

在国外,类似的思想也有人提出,但不是还处于朦胧状况,就是另有称呼。例如,在联合国专家研制的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1993)中,在讨论有关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的进一步扩展方向时,曾指出:“国际上正在努力扩展对环境和发展的分析范围,以包括社会和人口问题”,“在其他方法上形成的一致意见较少,尽管它们对诸如涉及社会和人口统计事项同环境事项的联系等特定分析领域,具有的重要性可能有所增加。”^②然而,我们在SEEA中始终见不到“国民大核算”的提法。在荷兰,人们称类似的东西为“国家核算体系”^③。而在德国,人们则称类似的东西为“超级总核算系统”。^④

尽管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一开始便表现出对此类国民核算新范式的浓厚兴趣,然而总的说来,目前有关研究的进展依然不大,尚处于探索性阶段。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我们思考面向21世纪的国家统计发展战略时,有关国民大核算的范式问题,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

一、有关国民大核算范式的历史考察

尽管国际上“国民大核算体系(SNALS)”提法的问世,还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但有关国民大核算的朴素思想,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笔者考证,人们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已经有了“国民大核算”思想的萌芽,而这一思想的首倡者,当属英国著名国民核算专家,198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者得主R·斯通。应该说,在斯通开始从事国民收入与支出估算研究时,甚至还没有“国民经济核算”一词。国民核算史专家现在一致认为,“国民核算”一词最早出现于1941年,其首倡者是荷兰经济学家E·V·克利夫。^⑤而世界上最早引发世人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思考者,当属英国经济学家J·R·希克斯(J. R. Hicks)。在其于1942年出版的《社会结构》(Social Framework)一书中,希克斯首次提出了类似我们现在所用的国民经济核算概念的“社会核算”(Social Accounting)概念,并提出可仿照单个企业会计记帐方法建立系统描述整个国民经济活动过程的宏观会计帐户。由于一方面希克斯在《社会核算》一书中主要叙述的是经济核算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一词含义太泛,易于同以人口、教育等非经济活动为对象的社会统计相混淆,因此,人们在高度评价希克斯有关“社会核算”这一伟大构想的同时,也对其“社会核算”这一范畴的用词不当提出了批评。也正因出于这种考虑,人们开始倾向于以“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取代“社会核算”概念,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国民核算审议委员会1958年重新审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正式确定了“国民经济核算”(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的规范称法后,“社会核算”才又成了社会和人口核算的代名词。

然而,R·斯通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没有人云亦云。斯通认为,希克斯的

① 该论文载《第三届全国统计科技进步获奖论文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1月版。

② 参见联合国等编:《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New York 1993, p30 & p119.

③ 参见谢洪礼:《关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评述(一)》,载《统计研究》,1998年第6期。

④ 参见彼得·冯德利著,范燕青等译:《经济统计学》,德国联邦统计局出版,1996年,中译本,第177页。

⑤ 克利夫1941年7月和11月先后在荷兰《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题为《国民核算:荷兰年度调查的经验,1938》等两篇论文。在文中克利夫首次提出了国民核算的概念。

“社会核算”实质上确实是经济核算，但可以称之为“经济方面的社会核算”，若因此就简单地取消“社会核算”范畴却是错误的，这样做无异于将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在斯通看来，我们既然可以有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核算，当然也可以有社会的其他方面的核算。对此，我们可从斯通在其代表性著作《国民收入与支出》(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①一书中始终坚持使用“社会核算”一词的事实中，得到印证。此外，斯通还在1984年12月8日发表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讲演中，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社会的分析应当建筑在三根柱子上：经济、社会——人口及环境现象的研究”、“污染、土地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等环境问题，对核算提供很多用武之地。但我们在这些领域做的工作很少，所以我将仅仅提一下在我开始讲演时说的对社会的研究应当依靠的第三根支柱。”^②显然，斯通的“社会核算”范式，包涵了“国民大核算”的隐义。斯通坚持“社会核算”的称法，意在表明国民核算的内容是广泛的，不仅仅是国民经济核算。当然，由于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初创时期，人们的主要精力还集中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建立与逐步完善方面，加上战后经济增长也被广泛地视为社会发展的头等任务，因此，人们长期以来并未关注有关国民大核算的问题。众所周知，就连斯通本人，也是直到60年代末，才开始身体力行地将“社会核算”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和人口核算领域的。进入70年代后，由于资源环境和社会等传统非经济领域问题日趋恶化，人们才开始越来越关注环境核算、社会和人口核算以及科技核算等新的核算领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的推动下，一些国家开始重新认识到“国民大核算”问题的重要，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迄今为止，除联合国的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以及我国有关国民核算专家在国民大核算体系(SNALS)方面已做出的种种令人瞩目的努力外，在E·V·克利夫的故乡荷兰，有关国民核算专家也在尝试着将国民经济核算、环境资源核算和社会核算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核算体系”。^③可见，有关“国民大核算”范式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的异想天开，而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宏观思维的历史突破。

二、有关国民大核算范式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及其评述

对于应否、能否以及如何构建国民大核算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目前国内外专家意见不一。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无关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顾名思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本来就只是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核算，至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等核算是其他领域的事，与国民经济核算无关。该派学者还认为，传统SNA在分析市场经济的结构和增长方面具有其它核算模式所不可取代的优势。就此而论，“传统SNA只限于市场交易的特征是其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因此，他们认为，无需将社会、环境、科技等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综合核算。在这些学者看来，所谓的国民大核算体系(SNALS)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也根本无此必要，因此，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④

(二)平行帐户论

① 参见(英)R·斯通等著，郭羽诞等译：《国民收入与支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参见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谢洪礼：《关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述评(一)》，载《统计研究》，1998年第6期。

④ 参见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93, p24

平行帐户论者认为,根据实物数据建立的独立的存量、流量帐户(如 R & D 帐户、环境与资源帐户等),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帐户,不必与 SNA 或传统的核算指标发生任何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 SNA 以及 GNP、GDP 等传统总量指标将继续保留使用而不作任何改变,伴随和补充它们的将是一系列有关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与环境,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平行帐户与指标体系,以此弥补 SNA 在核算视野上的缺陷。^①

(三)一个中心三个卫星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由于在人类生活中,“经济活动循环圈”、“社会人口活动循环圈”和“生态环境循环圈”这三大系统各有其独特的存在形态、表现形式、循环内容和运动规律,它们各自独立存在,各自依照自己的规律运动循环,因此,任何一个循环圈都无法包容别的循环。因此,不可能建立一个共同的整合平台,将各种核算内容完全统一起来。但是,由于在现代社会,不仅科技作为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三大循环圈之间的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内在关系,也正日趋明朗。因此,从国民大系统的角度看,它们又不能被设计成互不相干的东西。鉴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该派学者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为“中心”,以社会核算,环境核算和科技核算为“卫星”的多维立体化宏观核算体系。^②在这个“一个中心,三个卫星”式的多维立体化宏观核算体系中,可以分别两两相交,形成“交集”,比如社会与经济交互影响,可构成社会—经济核算子体系;环境与经济交互影响,便形成环境—经济核算子体系;科技与经济交互影响,又可形成科技—经济核算子体系。目前,联合国及我国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持该种观点。

(四)超级总核算系统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和科技等因素都是国民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应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算范围不断拓广,并最终建立一个涵盖一切的超级总核算系统。这个超级总核算系统不仅包含所有社会和人口、科技、环境与资源核算的内容,而且还应包含更多的有关福利方面的主观内容。^③根据该派观点,人们必须对 SNA 的核心框架作根本性的改变,以全面容纳有关社会、人口、科技、资源和环境方面的信息,从而真正实现全方位的综合大核算。

如前所述,有关国民大核算体系(SNALS)课题的研究,目前还仅仅处于初创阶段,在这一方面,学术界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范式问题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因此,不仅现在还远不是下结论的时候,而且,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该领域现在特别需要各种无拘无束的理论假设和身体力行的尝试实践,这是任何人在评论有关国民大核算范式的研究成果时,都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重要前提。基于此,笔者在此也要特别指出,下列评述意见,仅仅只是一家之言。

对于上述关于国民大核算范式的四种代表性的学术观点,笔者认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无关论”将经济与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与环境诸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完全割裂的观点显然是十分狭隘的。对此,我们不仅可从有关批评 SNA 忽视资源与环境以及社会等问题的

^① 参见朱启贵著:《可持续发展评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的有关介绍。

^② 葛守中:《论新核算体系的三大缺陷——兼论宏观核算的下一个目标》,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编:《SNA的新发展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1997年印刷本,第265页。

^③ (德)彼得·冯德利普著,范燕青等译:《经济统计学》,德国联邦统计局1996年版,第177页。

文章中得到印证^①，也可从近年来有关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大量研究文献中，找到理论根据。

第二，“平行帐户论”的观点虽因并不否定社会、经济、科技、资源与环境等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显然要比“无关论”来得科学，但由于指标体系在层次上远比宏观核算来得低级，因而它也最终难逃传统指标运动的俗套，^②难以真正满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国民核算模式改革的需要。

第三，“一个中心三个卫星论”应该说是在现有国民核算水平上较为可行的一种现实选择模式，它不仅具有比SNA更为广阔视野，而且能够较好地解决维护SNA核心框架的稳定与全方位提供有关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与环境等综合信息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但是，由于它还是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下通盘决策对核算信息一体化的需求，笔者认为它只能充当国民大核算体系过渡模式的角色。对此，本文下面将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第四，“超级总核算系统论”将国民核算扩大到包容一切的设想尽管美妙，但由于它无法找到将所有经济、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与环境全部整合起来的公共平台，因此将最终难逃“统计乌托邦”的命运。^③

三、构建国民大核算体系的现实可行性探讨

关于国民大核算体系的研究前景，笔者认为，我们有理由持乐观的态度。尽管目前有关总体模式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推动与协调下，各国统计学家已在有关理论与方法论的准备上做了不少工作。这些探索无疑为国民大核算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条件，积累了经验。在社会核算方面，由于R·斯通的积极推动，联合国统计处于1975年正式出版了《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一书。在这本被誉为集社会人口统计核算之大成的文献中，联合国专家们首次应用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社会人口统计领域进行了体系化核算的尝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SSDS不仅反映了自6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社会指标运动的新成果，而且也考虑到了用核算方法体现资料或指标间的联系，以及与经济核算之间的沟通。为了加强SSDS的推广应用，1978年联合国又公布一份名为《社会指标：初步准则和说明性数例》的文件，并于同年公布了一本名为《社会统计一体化研究专题报告集》的文集。1979年，联合国又发表了《改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统计：概念框架和方法(FSDS)》，逐渐形成了融汇社会、人口及相关专业统计于一体的概念框架和数据整理方法。1989年，联合国还在其公开出版的《社会指标手册》中，对FSDS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的总结。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国民核算专家又开始在有关社会人口与经济一体化核算方面展开研究。^④在环境

① 参见葛守中：《论新核算体系的三大缺陷——兼论宏观核算的下一个目标》，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编：《SNA的新发展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1997年印刷本，第265页及掘作《绿色GNP核算问题研究》，载《统计与决策》1998年第3期。

② 笔者认为，宏观核算比普通指标体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更好地体现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联系。对此，我国著名统计学家李成瑞教授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各指标体系之间及各环节间，理论和方法的阐述往往缺乏密切的联系，存在某此空隙，缺乏整体性研究。这种状况是造成某些人误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趋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李成瑞：《社会经济统计学在中国的应用和探讨》，载《第50届国际统计会议论文集》，国家统计局编印，第19页。

③ 德国著名统计学家彼得·冯德利普教授称这种企图为“统计万能幻想”。详见彼得·冯德利普著，范燕青等译：《经济统计学》，德国联邦统计局1996年版，第175页。

④ 荷兰中央统计局(CBS)甚至已在着手编制社会——经济帐户(SEA)。参见谢洪礼：《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述评(一)》，载《统计研究》，1998年第6期。

核算方面,我们看到,联合国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的成功研制,尤其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在科技核算方面,由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积极努力,也已取得较好的成绩。1963年OECD在意大利的Frascati举行会议,商讨科技统计的规范化问题,并于会后编制了一份文件,即著名的《Frascati手册》,后几经修订,影响日趋扩大。其中1980年版的《Frascati手册》,还得到了联合国统计机构的正式认可。在参照OECD《Frascati手册》的基础上,UNESCO编制并于1984年公布了《科学与技术统计手册》。该手册不仅具有比《Frascati手册》更为广泛的适应性和国际可比性,而且也开始强调了将科技核算与国民核算进行衔接的可能性。当然,在有关科技——经济帐户的研究方面,目前可以圈点的成果还不多,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初露端倪,已有许多经济与统计学家在进一步展开有关技术、知识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

以上各领域国民核算研究的动态表明,尽管已有的研究还不足以直接导致有关国民大核算体系的问世,但我们至少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趋势本身说明,有关国民大核算体系的探索,已在实践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国民核算领域除了已经研制出临时版的环境——经济帐户(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的进一步成熟外,有关社会——经济帐户、科技——经济帐户的问世,也是可以预见的。而一旦这些研制交叉核算体系的尝试取得成功,我们也就离国民大核算体系的最终建立不远了。

四、国民大核算的总体模式构想及其理论基础问题探讨

众所周知,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为传统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模式服务的,在决策思维上,具有强烈的“就经济论经济”的色彩。这种核算模式在新的强调社会、人口、经济、科技、资源与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前,明显存在着偏颇和不足。因此,为了避免政府决策上的“顾此失彼”,有必要增加对社会人口、经济、科技、资源与环境等领域的核算。然而,尽管这样一来确实可以达到扩大决策者观察视野的目的,但倘若不能在这四大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架起一座层次更高的“桥梁”,并通过它对所有具有外部效应的活动的综合成本效益加以总核算,则仍然无法为政府决策者提供纵观全局所需的核算资料。相反,由于整个国民核算依旧停留在“部门核算为部门管理服务”的水平之上,亦即经济核算只为经济管理服务,环境核算只为环境管理服务,科技核算只为科技管理服务,社会核算只为解决社会问题服务,因而经济因素“一叶障目”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新的矛盾也随之而来:当各部门在政策目标上出现冲突时,各部门因决策依据不一致,而极有可能陷入新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不休的困境之中,从而给政策制定造成新的困难。^① 从而,有关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以政策一体化为特征的决策思维方式的转变,也就难免沦为空谈。当然,有关领域交叉核算体系如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的研制与实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特别是在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情况下),但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终要求上来看,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之类的交叉核算体系,还是不可能完全满足其需要的。

^① 例如 对于诸如保留烟草行业对一个国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之类的问题,从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等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其结论可能是刚好相反的。这也正是我们目前一些政策只能“凭感觉”或决策者的部门偏好决策的重要根源。

鉴此，笔者认为，在弥补了有关社会人口、科技、资源和环境核算的空白以后，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政府转变决策思维方式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在社会人口、经济、科技、资源和环境等几大核算体系的基础之上，再构建起一个全新的国民大核算体系(SNALS)，并凭借它为政府提供全面而科学的决策依据。无疑，这一新体系的建立，将极大地促使人们对许多现有政策效应的重新审视，并有可能改变人们对一些现行经济政策的评价，最终为提高政府宏观决策水平和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武器。

关于国民大核算的目标模式，笔者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全新的“一个中心、三条纽带、四个卫星”式的体系架构：“一个中心”即以国民大核算体系(SNALS)为中心；“三条纽带”即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社会人口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SEA)以及科技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TEA)；“四个卫星”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环境核算体系(SEA)、社会人口核算体系(SSDS)和科技核算体系(STA)。对此，我们可用一个关系图表示如图1：

诚然，要构建国民大核算体系，首先必须解决如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决定国民大核算体系的核算目的(即指导其政策功能设计)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二是决定国民大核算体系构建原则(如核算范围、核算方法以及与四大核算体系的关系等)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只有在这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国民大核算体系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其从构想到实践的转变。

(一)国民大核算体系政策功能设计的指导理论

事实上，联合国大力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仅是导致国民大核算体系构想问世的直接诱因，而且也是决定该体系必须建立，并最终指导其政策功能设计的理论基础。对国民大核算体系而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第一，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人类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对那些同样影响人们长期生存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有关健康、安全、教育、公平、就业以及环境与生态保护目标的追求；第二，发展应该是协调的。这种协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社会、科技与环境等诸系统的内部各环节之间，而且应该全面体现在各系统的相互之间；第三，发展应该是可持续的。人类应该努力维持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产资源水平的衡定并使之得到逐步改进，使之既能满足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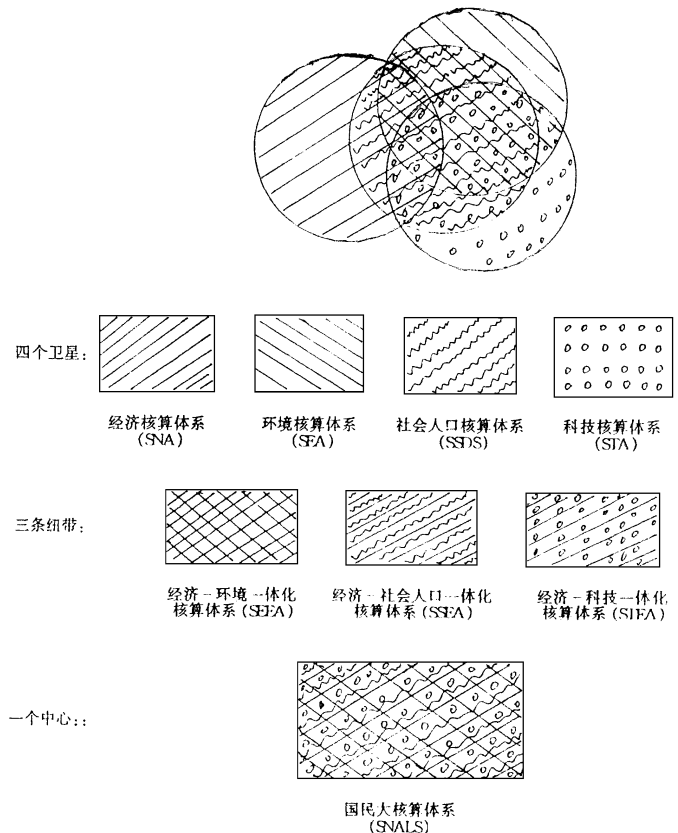


图1 “一个中心、三条纽带、四个卫星”式的国民大核算模式图

人的需要,又不至于危及后代人的发展。根据这一目前业已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接受的新的发展战略理论,政府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其在传统发展战略模式下形成的,单纯追求经济系统内部平衡的旧有决策思维方式,而代之以新的对每一经济行为的各种效应都进行全面衡量与整体核算的通盘决策思维方式。无疑,这一政府决策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要求作为政策分析工具的国民核算模式也能与之相适应。由于前已叙及的原因,这一历史的重任不可能由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单独来承担,也不可能由仅仅在范围上扩大到社会、科技与环境领域的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的社会人口、经济、科技、环境与资源这四大核算体系或“一个中心,三个卫星”式的,缺乏统一的核算对象、核算范围、核算原则和方法的核算模式来承担,而只能由构想中的国民大核算体系来承担。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不仅决定了建立国民大核算体系的必要性,而且也决定了该理论在国民大核算体系政策功能设计中的指导地位。

(二)决定国民大核算体系构建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有关决定国民大核算体系核算目的并指导其政策功能设计的理论基础,那么,笔者认为,现代经济学中著名的外部效应理论,应该也足以成为决定其构建原则的理论基础。根据外部效应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第一,在不存在外部效应的领域,由于企业的生产成本完全反映了它的社会成本,企业的收益完全反映了它的社会收益,因此市场机制在此能够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无需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这种特征反映在对国民核算模式的要求上,就是只需进行“就经济论经济”式的传统国民经济核算,而无需进行同时考虑多个主体及众多方面的国民大核算;第二,在存在外部效应的领域,由于企业成本不能完全反映其社会成本,企业收益也不能完全反映其社会收益,因此,只有借助于政府的直接干预,才有可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或社会福利的损失。然而,政府进行直接干预的依据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加入了外部成本(或收益)后的企业产品单位总成本(或总收益)与其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而要全面核算出企业的外部成本(如外部经济成本、环境成本、科技成本、社会成本)或外部收益,就必须扬弃传统的只“就经济论经济”的核算模式,而发展出一种能够达到综观全局,或通盘决策要求的国民大核算模式。显然,我们由此也可以推论出这样的结论:即凡是在存在外部效应的领域,不管这种外部效应是外部经济效应、外部环境效应、外部科技效应,还是外部社会效应,都必须进行大核算,都是国民大核算体系的核算范围。而在不存在外部效应的领域,则只需进行传统的单一核算。关于国民大核算体系(SNALS)在整个国民核算大家族中的地位及其与SNA等四大核算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可作如下理解:

第一,国民大核算体系构想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对现行经济、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与环境核算体系这四大核算体系的否定,当然也并不意味着对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等交叉核算体系的否定,相反,由于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政策功能、理论基础、核算对象与核算方法,因此,它们相互之间不但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互补性,而且,现行四大核算体系及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等交叉核算体系的存在,还是新的国民大核算体系这种更高层次核算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

第二,国民大核算体系必须建立在现有经济、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与环境四大核算体系的基础之上,但又绝不是这四大体系的简单汇总,而是一种处于更高层次的,服务于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模式的“一个中心,三条纽带,四个卫星”式的全新核算体系。而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等交叉核算体系,则为从四个卫星到一个中心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联系纽带。

国民经济运行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谢洪礼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economic security, builds an indicator system to assess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resents assessments to China's economic security status in 1990s.

关键词：经济；安全；评价

一、建立国民经济运行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重要性

追求稳定与安全的社会经济环境,是每一个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责。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大大加强了;同时,各国经济间的磨擦、对抗乃至斗争也大量增加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上一些大国十分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其中美国总统曾一度将国家经济安全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俄罗斯制定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等。

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性阶段,经济运行容易产生剧烈震荡,经济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生产力的释放,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粗放型,产业结构、国民经济质量等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明显增大,风险也随之增多了;第四,我国还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综合国力、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都还比较薄弱,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较大,加入 WTO 后,我

第三,虽然我国目前因追求经济增长而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等负面问题,尚不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那么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我国开展有关国民大核算体系的研究不具有紧迫性。相反,作为有经验可资借鉴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应该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而且,由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不完善,市场失效的领域更多,政府宏观调控的任务也更重。因此,及早在我国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大核算体系,无疑具有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笔者呼吁我国有关部门尽快开展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戴亦一,男,32 岁,经济学(统计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计统系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许亦频)